

# 学术著作的翻译困局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很多年以来，外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存在着一种忧喜参半的局面。一面是品种数量越来越繁多，一面是译作质量越来越可疑。简单地说，这不只是个别译者或出版商的急功近利所致，而有其体制性的障碍。

**关键词：**翻译；体制性的障碍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

很多年以来，外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存在着一种忧喜参半的局面。一面是品种数量越来越繁多，一面是译作质量越来越可疑。有些重要的著作，如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由于一个不合格译本的抢先出版而遭到了“双重谋杀”：拙劣的译本本身是对原著的一次谋杀，同时也耗费了一个好译本的潜在市场，从而谋杀了重译的机会。学界对此已有诸多尖锐的批评，却始终难以扭转这样的困局。

笔者曾对几本汉译英文著作做过局部核查，发现无一例外地都存在明显的“硬伤”和误译。也曾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予以苛评。但后来自己涉足翻译和校对工作，才深感学术翻译的困境所在。简单地说，这不只是个别译者或出版商的急功近利所致，而有其体制性的障碍。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翻译学术著作要比想象的慢得多。即便译者在语言与专业两方面都能胜任，合格的译作也是相当耗时费力的工作。沈昌文先生曾谈到仰仗一些老教授的“慢工出细活”来保证翻译质量。他们用“打太极拳的速度”每天只译 500 到 1000 字，戏称为“卫生翻译”，因为过了 2000 字就会“伤了元气”。优秀和严谨的译者往往要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的劳作中才可能企及所谓“信达雅”的标准。陈嘉映之译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邓晓芒之译康德，邓正来之译哈耶克等，都历经长达数年、甚至 10 多年的长途跋涉。

然而，艰辛的学术翻译工作往往“得不偿失”，既无法赢得市场的等值回报，又难以获得体制的充分承认。译作的稿酬或版税普遍低于所谓“原创作品”的所得。而在目前学院的考核与职称评定尺度中，翻译作品只能勉强作为参考性的学术成果。在这样的知识生产机制中，投身翻译工作意味着某种“奉献”，而严谨认真的翻译几乎是自虐性的牺牲。于是，“胜任的不愿做，愿做的不胜任”导致了学术翻译领域中的恶性循环状况。近年来，有几位外语

和专业都非常出色的著名学人，因为将译作或编译作品权作自己的原创著作而涉嫌学术剽窃，遭受非议也令人痛惜。除却个人的学风操守值得检点之外，体制性的不当安排或许也是让人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间接原因。

近日读到台湾远流图书公司陈巨擘先生的文章，论及学术书籍翻译的困境。他认为台湾基本上是“对学术翻译很不友善的地区”，因为在台湾“国科会”和“教育部”所制定的学术评量标准中，基本上没有翻译作品的位置。陈先生建议，应当修改目前的评量标准，将翻译作品作为学术著作，而且把翻译列为教授升等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建议对大陆学院的体制改善也不无启示意义。

## Translation Dilemma of Academic Works

Liu Q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many years, translation publish of foreign academic works is both worried and hopeful. The more the amount is, the lower the quality is. Simply say, it is not only due to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but also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收稿日期: 2008-6-2

作者简介: 刘擎(1963- ), 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